

邸富生 著

中国方志学史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中国方志学史

ZHONGGUO FANGZHIXUE SHI

邸富生著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1990年·大连

中国方志学史

邱富生 著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85千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姜忠宽

封面设计:达野 责任校对:鲁人

印数:1—2000 定价:4.50元

ISBN 7-5632-0069-X/K·2

序

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继承传统的形式,撰述时代的内容,应祖国建设的历史需要,十年来修志的巨潮,遍及全国的省市县三级。到本世纪末,将有以几十亿字计的几十部省志、三百余部市志和近二千部县志问世。这在中国修志史上亘古所无,也将使全世界各大图书馆为收藏而患书满。这样一桩巨大的文化事业,需要有其自身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修志是中国独有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事业。追溯修志的历史足迹,探讨志书的缘起、性质、功能、体例、编修组织和方法的演变,阐明其演变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趋向;论述方志学的发轫各种观点和见解的积聚,理论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历史背景和现实价值,举凡这些都是撰修新方志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也是建立新方志理论的必不可少的历史总结。

修志的现实,呼唤着《中国方志学史》的问世。邸富生先生所著此书正是应时所需,对修志工作者来说实在是久旱“及时雨”。方志学史前无专著,此书筚路蓝缕之功,当著录于其后的方志学的著述中。至于书的内容,非我敢笔诸书端,请广大读者读而后论。不成序,又别无题名,愧为之序。

薛虹

1990年3月于长春

前 言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卷帙浩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真继承、发扬和创新。近十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局面,并着手整理历史上的旧方志。广大从事修志工作者以及对地方志书有兴趣的各方面人士,都希望全面了解中国地方志书的起源、性质、作用、方志学理论的各种观点以及历代编修状况,吸收其精华,为当前编修方志服务,为方志理论建设服务。《中国方志学史》就是为满足上述要求而撰写的。

在学生时代及以后的工作中,我虽然翻阅了不少地方志书,但真正学习方志理论是从1980年以后开始的。由于教学的需要,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久川教授要我讲授中国方志学。1981年8月在太原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的大会上,我见到了大学时的老师来新夏先生,我对老师谈了开设中国方志学课的困难。来先生仍如在校时一样热情,当即表示要给我“补课”,并让我参编他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在编书的过程中,我从来先生及其他同志处学到了方志学的有关知识,并使我有勇气在1982年秋季开出了“中国方志学”课。因此,我走上方志学研究和教学的道路,是和田久川同志的督促和老师来新夏先生的教诲分不开的。从1984年起,我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又开始研究中国方志学史。这之中,我曾两次到北京向方志学界的老前辈傅振伦先生请教,傅先生不但热情接待讲解,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书籍,令人十分感动。在写作过程中,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科研处的同志,都提供了极大方便;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薛虹教授,也在百忙之中写了序言,并

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众多老师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之下，本书才得以完成。值此付梓出版之际，谨向老师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方志学史》，有一部分是自己研究所得，但大部分是吸收他人成果或摭古籍原文编纂而成。没有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成果，本书是难以问世的。为此，特致谢意。

《中国方志学史》系拓荒之作，酝酿时间较长，但写作时间十分仓促，学术界一些先进成果难以真正吸收，众多资料难以看全，加之本人能力所限，错误之处，望海内外学者不吝教正。

邸富生

1990年3月于辽宁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方志的起源	1
一	方志产生的基本条件.....	1
二	方志之源——商代史官的甲骨卜辞.....	2
三	西周、春秋时期方志的萌芽与《周礼》.....	5
四	《禹贡》和《山海经》.....	9
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	11
一	《史记》、《汉书》与方志.....	11
二	名称繁多的志书	13
	（一）郡书	14
	（二）地理书	15
	（三）都邑簿	17
	（四）图经	18
三	综合性志书的出现	19
	（一）《越绝书》	19
	（二）《畿服经》	20
	（三）《华阳国志》	21
四	郦道元《水经注》与方志	24
五	方志学理论的萌芽	26
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方志	28
一	封建政权对修志的重视	28
二	图经的繁盛	30
三	几部著名的唐代志书	33
	（一）《括地志》	34
	（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贞元十道录》	35

	(三)《元和郡县图志》	37
	(四)《蛮书》、《太原事迹记》和《两京新记》	38
四	方志理论的发展	40
第四章	方志的定型与方志学的形成时期——宋朝	44
一	图经的盛行及其向方志的过渡	44
二	体例的完备与内容的丰富	50
三	空前的修志盛况和著名方志	53
	(一)修志盛况	53
	(二)宋代的名志	55
四	方志学的形成	59
	(一)宋代方志学家的方志理论	59
	(二)周应合对方志学理论的卓越贡献	65
五	宋代方志繁盛的原因	69
第五章	方志的稳定发展时期——元朝	72
一	一统志的创编与全国性总志的编修	73
	(一)《大元大一统志》的创编	73
	(二)总志的编修	74
二	元代的名志	76
	(一)《齐乘》	77
	(二)《大德昌国州图志》	78
	(三)《延祐四明志》	78
	(四)《至顺镇江志》	80
三	元代对方志理论的研究	81
第六章	明代方志的兴盛和明朝人的修志主张	88
一	封建皇帝多次诏令编纂志书	88
	(一)朱元璋及其子孙与总志的纂修	88
	(二)明代诸皇与地方志书的纂修	90
二	明代方志的发展	94
	(一)众多的志书	94

	(二)志书种类的增多	96
	(三)志书体例的完备	100
三	明代学者对方志理论的研究	104
四	明代志书简评	110
第七章	中国封建社会方志的全盛时期——清朝	115
一	清代方志的纂修	115
	(一)《大清一统志》的编修	116
	(二)省志、府州县志的纂修	120
	(三)清代私家撰修的志书	127
二	清代志书的体例	129
三	清代学者修志、辑佚与对方志的利用	132
	(一)众多学者修志	132
	(二)清代学者的辑佚活动	134
	(三)清代学者对方志的利用	135
四	清廷对志书的控制与禁毁	136
第八章	清代方志学的发展	140
一	清初学者对方志学理论的贡献	141
	(一)顾炎武的方志学理论	141
	(二)方苞的修志主张	143
二	康熙、雍正、乾隆的方志思想	144
三	乾嘉时期的修志派别及其论争	148
	(一)封建士绅派	148
	(二)考据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149
	(三)史志学派	152
	(四)史志学派与考据学派的主要区别和论争	152
四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	155
	(一)方志的性质	156
	(二)如何以“史家法度”编修方志	157
	(三)如何保存修志资料	162
五	清朝末年的方志学研究	163

第九章	民国时期志书的纂修	169
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志书的纂修	170
二	中华民国统治加强时期志书的纂修	176
	(一)《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	176
	(二)通志的编修	178
	(三)市志的编修	183
	(四)县志的编修	184
三	抗日战争时期志书的纂修	194
四	中华民国覆亡时期志书的纂修	199
第十章	民国时期的方志学	203
一	方志学论文和专著	203
	(一)众多方志论文的发表	203
	(二)方志专著	207
二	方志理论研究	213
	(一)高度重视地方志的科学价值	213
	(二)对章学诚方志学的研究	214
	(三)方志性质和渊源、功用的研究	216
	(四)关于编纂方志的研究	218
	(五)官方的修志要求	223
三	方志目录学的创立和方志统计、收藏的研究	224
	(一)中国方志目录学的创立	225
	(二)方志统计	231
	(三)方志收藏的研究	232
四	旧志的整理与利用	233
	(一)旧志刊印	233
	(二)古方志辑佚与考辨	235
	(三)旧志资料的利用	236

第一章

中国方志的起源

方志起源是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之一。自宋代以来,众多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对这一问题作过多方面的考辨,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有曰应导源于《周官》,有云源头是《禹贡》,有称应溯源到《山海经》,还有人认为昉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也有人提出《华阳国志》是方志的鼻祖。这些不同说法,各言其是,长期并存。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方志起源,中国学术界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定于一尊。有人提出方志起源于周代的“古国史”;有人认为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还有些人提出方志起源于汉代的地记和图经。与古代学者相比,现代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有探讨的余地。

一 方志产生的基本条件

探讨方志起源,就是查寻方志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众所周知,所有的科学,都是为适应人们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当然,方志作为一门科学也不例外。

地方志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也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一般说来,方志的出现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一个版图较大的中央政

权的出现；第二，中央政权按地域划分进行统治；第三，社会实践的内容日趋广泛、复杂，致使统治者必须对所辖地区的情况加以收集、整理和记载，方能掌握、运筹决策；第四，文字的出现并较为广泛地使用。上述条件具备，就有了产生方志的可能性。

恩格斯指出，形成国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一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的设立”。^①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已经具备上述两个特征。传说夏代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平，懂得了变水灾为水利，农作物产量已大大提高，并已知造酒；和农业有关的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出现了“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② 社会现象的日趋复杂，使当权者对所辖方域内的情况加以记述成为必要，而从事专职文字工作的官职人员的出现，使得这种记录成为可能。就是说，在夏朝已经具备有产生方志的条件。但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乏，对于夏朝的全面情况难以考查，因而对方志的起源也难以断定。

二 方志之源——商代史官的甲骨卜辞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在夏代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商的国家组织不断趋于完备，形成了相当复杂的体制。商王之下有位高权重的冢宰或师尹，其次的政务官有司徒、司空、司寇、司马等及所属僚佐，分掌各项具体事物。此外，还有总管一切“神事”，对一切军国政事都能起直接或间接支配作用的以巫为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以及从巫职机构脱离出来的太史、内史、御史等王室的重要职官。他们虽然是一般的政府官吏，但由于所承担的职务多与文字记录现实状况有关，因此，史官的职掌便与方志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商王朝的统治区分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除王都外，有不少城邑是王室诸子和贵族的封地。这些封地接受商王的封号，用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规定贵族的等级，明确方国的地位。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人力，遵守一切礼仪，是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每一方国，都仿照王室建立地方性的政权机构，设有军队、监狱，征收贡赋，统治该封地的人民。畿外的方国承认商王为他们的“共主”，有的也接受封号。见于甲骨文中较著名的方国有土方、鬼方、邛方、羌方、周方、人方等等。统治者从政治上的统治需要出发，为掌握所辖地区的自然、经济、民俗风情等情况，便设有相应的官吏对当时的现状进行记录。这些现状的记录，便是产生方志的源。

中国早在商代有了史官，在典籍中有明文记载。《吕氏春秋》曰：“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至旦大合拱，史请卜其故。”《帝王世纪》载：“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祈’。”1936年6月，董作宾在《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建立了“贞人”说，断定贞人是殷代记事的史官。史官在商代一般多直呼为史，也称卿史，记录现状的史官称作册。商代习俗尚鬼，“凡祀与戎皆卜”，^①“大事记于卜辞，王命铸于鼎彝”。^②占卜便是史官的职掌。将占卜后的甲骨卜辞串联成册，储藏于宗庙中，也是经过史官之手。这样，便为后人造就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资料宝库，甲骨卜辞的记载在许多方面与后世方志有着许多共性之处。

① 《史记》卷3《殷本纪》。

② 丁山：《甲骨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32页。

文字的出现并较为广泛地使用,是方志产生不可缺少的条件。有了文字,才使记录现状真正成为可能,才能使后代人对前代人的活动有所了解。1899年,人们发现了商代史官整理收藏的甲骨册,历经80余年的研究,在出土的15万片以上的甲骨中,已发现甲骨文字有5000个左右,已识字1000个以上。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商代已有文字出现并广泛运用。

商代记于甲骨之上的卜辞,与方志关系极为密切。河南安阳与陕西岐山所出土的甲骨卜辞,代表着两个不同地域上的商与周的情况。从中可看出,这些甲骨卜辞与方志有着若干共性。其一,“记载现实,反映当代”。其二,“以时为序,再系以事”,同方志中的大事记非常相似。其三,“记载地方,内容丰富”。从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看,甲骨卜辞反映的社会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内容按类划分,则包括: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农业、渔猎、畜牧、手工业、商业、交通、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卜法、文字及其他。甲骨文卜辞的这一特征,与地方志极为相似。其四,“资料翔实,述而不论”。甲骨卜辞记事准确。清人王国维依据甲骨卜辞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订正了《史记·殷本纪》中的错误。卜辞这种“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特点,与方志的功用是一致的。^① 总之,商代具备了产生方志的社会条件,史官所记而产生的甲骨卜辞,带有后世志书的某些特点,而方志的源头则应从商代史官找起。

^① 详见敬斋《方志 史官 卜辞》,《中州今古》1986年第3期。

三 西周、春秋时期方志的萌芽与《周礼》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王朝代商而有天下,对商王朝的各种制度又有了比较重大的发展。周建立了庞大的统治机构,各种官吏日益增多,史官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不同名称的官员;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为了统治的需要,如鲁、郑、齐、卫、晋、楚、宋、秦等国,也有史官的设置。正是这些中央王室和地方诸侯的史官及其有关官吏,随时记录了各地的事件与言论,保存了各自辖区内社会变化的现实情况。

春秋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周天子无力控制日益强大的地方上的诸侯国。各诸侯国都卷入了争霸活动。为了争霸的政治需要,他们积极搜集对方的地形、物产等各种情报,励精图治,以期达到称霸目的。由于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社会出现了巨大变革,各国统治者利用史官的记录为现实服务的要求更加强烈。各诸侯不但需要了解本辖区的各种社会动态,还需要随时了解周围各诸侯国的动向。因此,史官所记录的现状材料也就日益增多,内容愈加广泛。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作为辅治之书的方志,便在奴隶社会的土壤里经过长期孕育之后,破土而出了。

我们所谈的奴隶社会的方志,并不是后世所讲的定型的方志,而是方志的萌芽状态,或者说从中可以看到的后世方志的影子。它只是具备了方志的某些特征而已。

由于社会动荡、战乱和人为的原因,使中国奴隶社会的书籍很少保存下来,特别是只记载某些地方现状的志书,由于事过境迁,更不被后人重视;即使有些被后人编入到某些历史书里,也是面目

皆非，淹没在史籍的汪洋大海里。这给我们研究奴隶社会的方志带来极大不便。然而，披沙拣金，仍然可以看到奴隶社会的志书。

据《尚书·多士篇》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知殷代已有书籍。《尚书》何时编成，因资料缺乏，难以断定。

在西周至春秋时代，已有许多书籍，其中不少就是以志命名或者以记称之。现分录如下：

其一，志：

上志——《吕氏春秋·贵公篇》、《务大篇》。

志曰——《吕氏春秋·贵当篇》，《左传》昭公三年。

周志——《左传》文公二年。

郑志——《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十六年。

前志——《左传》文公六年、成公十五年。

古者有志——《左传》昭公十二年。

史佚之志——《左传》成公四年。

邦国之志——《周礼·春官·小史》。

四方之志——《周礼·春官·小史》。

军志——《左传》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

其二，记（记即志）。《仪礼·聘礼记》、《荀子·大略篇》引作《聘礼志》）：

上古记——《吕氏春秋·务本篇》

古记——亦作《故记》。《吕氏春秋·至忠篇》，《古记》曰：杀随兇者不出三月。《说苑·立节篇》曰：臣兄读《故记》，射科雉者，三月必死。

记曰——《管子·禁藏篇》。

春秋之记——《管子·法法篇》。

燕记——《方言》卷二《燕记》曰：丰人杼首。

此外，还有晋之乘，楚之杻杙、百国春秋等等（详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第35—38页）。

上述诸书，因大都亡佚，无法断定即今世之方志。但从书名看，确实是有以志为其名者。

多年以来，许多名为《春秋》的书籍大都被认为是史书，其实未必尽然，从幸存至今的孔子所编写的《春秋》就可以看出它和方志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编写的《春秋》，是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编年大事记。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间，诸侯国之间的访聘、会盟、战争及日食、地震、山崩、大水、大旱等。孔子本人不是史官，本来是不能掌握史官平时所积累的材料，但由于他在鲁国当过官，加之又是著名教育家和学术家，与官府往来密切，所以他能得到利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的资料的机会。《春秋》不是孔子的创作，他只不过是对于诸侯国史官平时积累的有关现状的资料加以编排删节而已。其目的是为当时政治服务。可以断定，各诸侯国史官对现状材料的积累，是孔子编《春秋》的基础。如果说《春秋》是一部史书，那么，这部史书恰恰是以各诸侯国史官对现状的记载为基础而编写成的。史称孔子修《春秋》时“得百二十国宝书”，即是指孔子看了 120 部志书。志是史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一个地区大量的现实情况的记载和积累，是不能写出史书来的。

方志的萌芽，可以从《周礼》一书中有些职官的职权范围中看得一清二楚。

《周礼》原称《周官》，记周王室的官制。马融、郑玄为其作注称《周官礼》，唐贾公彦为其书作疏始用《周礼》之名。此后《周礼》、《周官》二名互用，于宋以后则基本上都称之为《周礼》。此书是西汉中后期始出的古文经，故历代为人所疑，后经学者王国维等人考证，此书中的官名，至迟不出春秋之世周王室及鲁、郑、卫三国官制的范围，没有受到战国官制的影响，惟各官的职掌有同于战国者。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周礼》中记载的官制，探求春秋时志书的存在。